

解析“涨”声背后的困惑

——代表委员关注物价“四大焦点”

□新华社“新华视点”记者 罗宇凡 姜琳 李菲

从“疯狂的大蒜”到“涨价的辣椒”，从新一轮电价调整方案出台到各地自来水提价，从连夜排队给汽车加油到食用油价格集体上涨。过去的一年，尽管深深烙下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印记，但物价上涨和对上涨的预期不断牵动百姓神经。两会前夕，代表委员聚焦物价调整，解析百姓困惑。

牵动神经的“油盐酱醋”——如何保障“菜篮子”？

42 岁的夏月翔是北京市宣武区



椿树园小区的一名修鞋匠。他天天在小区菜市场里干活，目睹了去年菜价的波动。“趋势很明显，去年一直在上涨。春节前后肉啊、蒜啊、油啊，涨得更欢，收入低的家庭心里发慌。”

“物价持续上涨时，要着重关注城市低收入户的生活困难。”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说，一个馒头从 3 角变成 5 角，对于中等收入以上家庭不算什么，但对低保户来说可能事关“生计”。

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，去年农产品价格波动格外引人注目。特别是大蒜、辣椒等蔬菜的投机性交易，再加上突如其来的雨雪冰冻天气，导致菜价、油价、肉价一时“涨”声四起。

“必须看到，去年一些农产品的涨价背后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表示，恶意炒作、囤积居奇等问题，在无形中推高了物价。对此，在政府总体上强调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同时，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监测，对串通涨价、捏造散布涨价信息、以次充好、变相抬价等违法行为，严肃查处、严厉制裁。

看不明白的“价格指数”——CPI 统计如何更可信？

虽然物价上涨看得见也摸得着，但反映物价水平的 CPI 指数，去年却连续保持 10 个月的负增长。采访中，许多百姓提出同样一个问题：“生活成本在提高，价格指数却在下降，就是增长也涨得波澜不惊，我们的 CPI 数据是否可信？”

致公党中央在提交本次政协会议的一份提案明确提出，目前我国的 CPI 样本较为陈旧，已难以全面反映物价变动真实情况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表示，我国现行 CPI 统计样本与体系，基本沿用 1992 年确定的地域网点和品类权重，计划经济色彩较浓。但 17 年来，中国经济发展迅猛，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，这使各类居民消费的权重随之发生重大变化。

在我国现行 CPI 指标体系中，居住类消费占比权重过低，而食品类消费占比过高。这就是为什么猪肉价格一动，物价就动，而房价不断上涨却丝毫不反映在物价指数上。

致公党中央提案提出，CPI 各项指标的权重及相关资料，在许多国家

都是公开的，但目前在我国统计部门的网站上则无法获得。在 CPI 信息收集、编制整理过程等方面，目前距信息公开相差较远。该提案建议，应根据目前居民消费结构与消费模式，完善我国 CPI 指标体系。

蓄势待涨的“水电煤气”——公共产品缘何涨价？

家住湖南邵东县的姜丽华对去年的“气荒”记忆犹新。她给记者算了笔账，从去年 11 月份开始，14.5 公斤的瓶装民用液化石油气价格就一直往上涨，每罐从 80 元、90 元到 110 元，最后涨到 130 元都“断供”。

如果说去年年底南方诸省的“气荒”还带有季节性因素，那么新一轮电价调整方案，以及各地不断召开的提高水价、气价的听证会，则释放出一种明确的信号：水、电、气等公共产品特别是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上调是大势所趋。

“适当提价能有效避免浪费，也有利于节能减排，定价市场化是必然趋势。”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认为，长期以来资源价格过低的现实，鼓励了粗放型的发展模式。

“既要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，又要保证百姓日常生活，还要考虑收入

分配上的合理性，这项改革考验政府智慧。”蔡继明委员建议，政府应采取差别定价的政策，兼顾效率和公平。

“逢听必涨”的听证制度——价格究竟由谁定？

“每次涨价之前都要开一个听证会。”在被问到对物价制度的了解时，北京一家国企的员工田娜这样回答。在一些百姓心中，一些地方的听证会变成了“涨价会”。价格究竟应该由谁决定？究竟哪些事项应该听证？听证代表如何产生？听证意见如何形成？有什么作用？这些内容对于许多普通百姓而言，还显得比较模糊。

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表示，任何水、电、气等民生事业的价格调整，都应该广泛征集民意。政府应当尽力保持物价的稳定，在进行价格听证的时候，基层民意代表的比重应该更大一些。

全国政协委员陈世强建议，对于公共事业的价格形成，不能由单一政府部门或少数企业说了算。从长远看，还应当放开垄断行业竞争，鼓励民营企业进入，通过竞争降低生产成本。

政协委员聚焦三大『民生热词』



“蜗居”、“蚁族”、“被增长”……日前，政协委员聚焦 2009 年网络年度“民生热词”，纷纷建言献策，努力破解热词背后事关住房、就业和收入分配三大民生难题。

“蜗居”：“一高一难”的房改困局如何破解？

“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。”电视剧《蜗居》里的台词折射都市“房奴”的辛酸苦辣，道出都市无房族的困惑与无奈。“蜗居”一词迅速成为年度热词。

“高房价”“住房难”受到社会关注，也牵动温家宝总理的心。2 月 27 日与网民在线交流时，温家宝坦言，自己也知道所谓“蜗居”的滋味。“去年房价过快上涨，民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”他还说，“我有决心，本届政府任期内能把这件事情管好，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，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格位。”

如何让百姓早日圆上安居梦？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说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是政府的职责。作为 2010 年中央经济工作的重点，保障性住房建设将成为解决居民住房困难，遏制房价过快上涨

的重要手段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，在政策思路，上还应该积极探索能够在市场上交易的“适租房”，主要解决在廉租房层面之上的年轻白领、进入职业生涯前期的就业者、收入处在“夹心层”群体的住房问题。

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透露，今年各类带有政策性和保障性住房的数量，包括限价普通商品住房、经济适用住房、公共租赁住房、廉租住房，再加上即将启动的城市和工矿棚户区改造，共计将有 600 万套房子开工建设。

蚁族：“就业难”压力积聚如何释放？

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村的简陋民房中，聚居着一群上班无岗或收入较低的大学生，他们被称为“蚁族”。一些政协委员指出，“蚁族”现象折射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，特别是大学生“就业难”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。

目前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高校集中的城市，所谓“蚁族”群体数量越来越大，他们主要从事保险推销、电子器材销售、广告营销、餐饮服务等

临时性工作，许多人无“三险”和劳动合同，处于“半失业、低收入”状态。

全国政协委员柯惠新表示，“蚁族”构成中，有城市待业青年，也有农民工，但最受关注的是未就业或低收入的大学毕业生。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 630 万人，而往届没有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仍有数百万人。

“伴随我国高等教育快速扩张，教育产业化发展引发了毕业生人数激增以及专业结构不合理等现象。”柯惠新说，这加剧了大学生“就业难”等矛盾。

民盟中央一份提案指出，大学生“就业难”有一个深层原因，即我国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“大学生密集型产业”——高端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。我国仍处在产业链条的低端，吸纳大学生就业能力有限。另一方面，一些就业新政策可操作性差，缺少与之配套的档案管理、人事代理、社会保障、职称评定等制度改革，在推行中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。

“不需要教育年轻人怎么选择，重要的是通过政策来引导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郝杰英认为，要吸引大学生去中小城市和乡村就业，政府要给予更完善的配套服务。

目前，我国已通过创业优惠政策、西部计划、大学生“村官”计划等吸引大学生到基层就业。权威部门向记者透露，今年我国将扩大各类基层就业项目规模，积极出台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新政策。

“被增长”：收入增长如何“跑赢”GDP 增速？

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，“被 XX”成为网络热词。被就业、被代表……然而，争议最大的还是收入“被增长”。一些政协委员表示，“被增长”虽然是对统计数据真实性的质疑，但其背后，却是公众对工资收入增长缓慢、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不满。

2009 年 7 月，有网友对有关居民收入增长的数据表示不解，称实际

没有增长，只是统计数据中增长了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，我国收入分配失衡，在国民收入中用于雇用职工的工资比重下降。我国劳动报酬额占 GDP 的比重 1996 年为 53.40%，2007 年为 39.74%，10 年下降了 13.66 个百分点。

“大企业强国，小企业富民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固说，小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生产性农户等“草根经济体”的发展，与百姓生活和收入息息相关，但“融资难”却很突出。去年银行信贷投放创历史天量，投放到“草根经济体”的贷款仍很少。因此，今后需要强化“草根”金融体系，发挥“草根经济体”应有的作用。

“当前急需着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。”宋晓梧表示，一方面要提高劳动报酬的收入比重，提高服务业的就业比重；另一方面要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，完善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。“让收入增长赶上经济增长水平，事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局，也有利于缓解分配不公造成的社会矛盾。”

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传来消息，我国将稳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，推动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，督促各地及时上调最低工资标准，并加强对最低工资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。同时进一步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，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。（据新华社电）

